



□ 曹润青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礼记·礼运》篇“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观念，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高远的社会理想。这一理想既以“天下”为单位，涵盖整个世界，从而超越单一国家、民族与文化的个别立场，体现最为普遍的人类立场；同时，它又以“公”“同”为价值追求，超越民族、文化、国家间的等级观念与歧视偏见，传递全世界全人类命运与共、和谐共生的价值理想，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提到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指出这一观念对于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特性具有重要认识价值，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宝贵思想资源。

古代中国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天下为公”和“天下大同”都出自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在《礼运》中，孔子提出并区分了“大同”与“小康”，而“天下为公”正是大同世界的根本精神，与“天下为家”的小康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礼运》篇作者看来，小康对应的是禹、汤、文王代表的夏商周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国家最高政权的继承形式由禅让制发展到世袭制，政治权力归君主专制私有，私有制也因此成为社会基本制度，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以家庭为单位占有生产资料与社会资料。与这种社会制度相对应，国家形成以严尊卑、别善恶、明赏罚、界内外为主要内容的礼制秩序。

尽管小康社会已经达到一定的文明水平，但是《礼运》作者认为在小康社会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的理想社会，这就是天下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历史上，大同社会对应的是五帝时期，特别是尧舜执政天下的这段时期。与小康社会不同，大同世界的根本精神是天下为公。这首先表现在最高政治权力的继承方式是“传贤不传子”，权力的继承标准不在血缘，而在德行与才能。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表明天下不是私人财产，而为天下之人共同拥有。正因为如此，大公无私成为大同世界的组织原则和运行机理。在政治上，人们平等参与，选贤任能；在经济上，社会普遍富

裕，盗贼绝迹；在观念上，“不必藏于己”“不必为己”，人们超越私有观念，关心社会，以参与劳动、奉献社会为常态；在伦理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们超越一家之私，以更高的社会价值为追求，共同创造社会整体利益和福祉；在社会关系上，人人平等且各尽其能，在充分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灾民弱者提供积极的社会救济，体现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与小康社会建立在私有观念之上、严加区隔分别的社会形态不同，大同世界呈现出一幅天下为公、不分彼此、人人为公的美好图景，这幅画面被《礼运》篇概括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入”的凝练表达，代表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关于世界与中国的最高理想。

春秋战国是旧有礼乐秩序崩溃瓦解的时期，孕育于这一时期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观念首先表达的是对传说中尧舜时期禅让制的向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对民众征以苛捐杂税，并驱使他们服繁重的劳役兵役，在苛政猛于虎下，生民憔悴不堪。面对严峻的社会问题，《礼运》作者重提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度与大同社会，希望君主意识到权力并非私有产物，而是为广大人民所拥有。此后，禅让制虽然未能在历史上继续实行，但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观念却从具体制度中脱胎出来，成为一个普遍的政治理念，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表达权力的来源在于公众也就是百姓，凡是代表了百姓利益的权力才是正当的。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

权的郡县制国家，国家制度与先秦时期完全不同，但是在《吕氏春秋》这本体现秦国意识形态的书籍中，“公”的思想却占有核心地位，书中反复申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由此可见，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观念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观念，在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思想基础。

世界秩序的想象和思考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虽然最早是就禅让制而产生的观念，但由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在观念中内在地包含着天下的维度，因此它们也内在地包含着中国古人对天下即世界秩序的思考。与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不同，先秦时期特别是周代形成了天下共主、分封众建诸侯的国家形态，这意味着此时的中国兼具双重身份，它既是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权力建构起来的国家形态，同时又是一个天下共主之下、诸侯国林立、夷夏有别的世界体系。尽管先秦时期的中国显然不等于地理意义上的整个世界，但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下，中国就是当时人们所能感知的世界，因此在观念中，中国同时就意味着世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观念从根本上表明天下秩序即世界秩序应当建立在“公”“同”的基础上，而“公”“同”就意味着“王道”。大

体而言，中国古代的这种王道原则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王道是普遍的。早在《尚书·周书·洪范》中就讲：“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没有偏私、没有阿党，王道是如此的广远不狹吝、容易无阻碍；不违背常识、不倾斜狭隘，王道是如此的公平正直。为了维持世界秩序的稳定和谐，王道首先要以普遍性作为自身的要求，不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由此损害别国的利益，照顾和维护世界各国共同利益是王道的根本要求。第二，王道是“以德行仁”，与“以力假仁”的霸道相区分。孟子继承了先秦以来的王道思想，他提出“王霸之辨”的区分，指出王道的核心在于以道德为基本原则来建立与他国的关系。孟子讲：“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在孟子看来，霸道依靠的是武力压制，他国并非真心归服；王道则凭借道德，实行仁政，通过积累使自身强大，逐渐取得别国信任。在孟子之后的荀子讲“义立而王”，同样认为立足于仁义的国家才能真正取得别国信任，建立起和谐的世界政治秩序。第三，王道以重视民生为宗旨。孟子“保民而王”的观点高度概括了王道思想的这一内容，王道并非为了称霸，相反，王道是以保民为目的，并因为保民受到了百姓的拥护。董仲舒在《春秋繁

露》中讲“王者，民之所往”，王安石也讲“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这些论述都表明王道以重视民生民意根本宗旨，至于安顿天下则是随之而来的政治结果。中国古人在先秦时代形成了以“王道”为基本内容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观念，成为中华文明理解和思考世界秩序的思想起点，成为建构万类共存、协和万邦世界图景的思想基础。

道德境界的塑造和拔升

在历史中，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观念不仅指向外在的社会理想，它们同时也指向高尚的精神境界，二者互为表里、互相支撑。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从精神修养的层面上要求个体超越一己一家一国之私，在更普遍的意义对上对“人”本身产生同类相通之同情，从而生发出博爱之情怀。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在这一点上有着广泛的共识。《论语》中多次记载了孔子的相关论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当学生问孔子仁的含义时，孔子以爱人来解释仁，由此可见广泛地爱人是仁德的重要内容。在教导学生如何成长时，孔子指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认为当青年人具备了孝悌谨慎的基本德行后，应当更进一步做到“泛爱众”“亲仁”与“学文”，“泛爱

众”代表着更高的德行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则进一步落实了“泛爱众”的实践原则。由此来看，尽管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始终强调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但是这一立场更多是基于对客观现实的承认，即人对他人的爱是通过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过程来实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是囿于血缘关系的狭隘立场，恰恰相反，儒家始终强调博爱是人应当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就指出能够做到博施济众可谓是圣人的行为。孔子之后，孟子继承了以爱言仁的传统，指出“仁者爱人”，并进一步提出“恻隐之心”发展了这一思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人都有对他人的同情之心，这是人性本有的道德情感与意识，而这道德情感与意识正是博爱德行的人性论基础。因此在孟子看来，人人都应有对他人的不忍之心，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之外，墨子提出“兼爱”思想，要求人人兼相爱交相利，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墨家的博爱主张。宋明时期思想界形成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学思想，进一步从哲学上深化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承载的博爱传统。程颢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讲“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统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这些论述表明世界在本源上即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体，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因此人处于天地之间，就应当知觉个体属于世界这一整体，不当因有“我”的意识而产生我与他者的隔绝乃至对立。正是基于对“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这一理解，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之说，指出人应该承担责任，为天地代表的自然、为生民代表的天地、为往圣代表的文明、为万世代表的历史而承担应有的责任，这一精辟论述正是对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包含的博爱传统的最好阐释。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中国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上接1版）

全力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落实落细海关优化营商环境16条，持续开展“海关关长送政策上门”服务，千方百计助企纾困。充分释放“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主动披露等政策红利，指导企业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协定，增强企业获得感。扩大“直装直提”“组合港”等便利化措施实施范围，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动开展全国“智慧口岸”建设试点。大力实施2023年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全面做好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国际贸易”指标迎评工作，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

全力促进外贸稳增长。深化综合治税，巩固税基、拓展税源，努力完成税收预算目标。推动外贸结构优化升级，出台专门措施支持新型、高附加值产品保持出口新优势。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促进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健康发展，积极稳妥扩大保税维修业务试点范围。做好外贸数据发布和解读，开展好中国海关外贸景气指数、“一带一路”贸易指数等海关特色指数编制，释放积极信号、提振市场信心。

全力促进制度型开放。支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更大力度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优化口岸开放布局，畅通国家战略骨干通道，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全力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推进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大全业务全流程全生态场景压力测试力度，加快出

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关监管办法，稳步推进封关运作各项准备工作。推动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改革落地实施，尽快完成发展绩效评估办法修订工作，持续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中国海关规则、标准“走出去”，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全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聚焦关键产业和核心技术，研究制定强链、补链、畅链、升链的针对性措施。积极稳妥推进食品农产品检疫准入、加快优质种质资源引进，创新大宗商品检验模式、保税监管模式，着力保障粮食、能源、战略性矿产资源多元稳定供给。认真落实高新技术产品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先进技术、重要设备等产品进口，支持国家重大项目建设 and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服务大国外交毫不懈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成为广泛国际共识，引领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智关强国”行动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实施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行动和积极参与对外斗争行动，充分发挥海关处在开放前沿和对外斗争一线的作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积极服务元首外交。落实国家外交战略，以服务习近平主席重大外事活动为主线，围绕贸易便利、检验检疫合作、生物安全、打击走私等海关业务领域，加强议题设计和主动对接，形成更多海关合作成果。提前谋划，认真准备，丰富完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海关成果设计，筹备办好

海关食品安全研讨会。强化元首外交成果长效落实督办机制，确保落地见效。全方位做好我国举办的重大国际赛事、活动等进出境监管通关服务保障工作。

深化海关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海关治理体系改革和重塑，密切跟进中方完善世界海关组织（WCO）选举规则提案落实进展，筹备召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智慧海关”国际研讨会，发出《智慧海关倡议》。认真筹划第六届全球海关AEO大会等海关主场外事活动，推进AEO国际互认。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亚国家、金砖国家等海关合作，全方位推动机制化建设发展，助力中欧班列发展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构建与大国海关新型合作关系、与周边国家海关稳定合作关系、与发展中国家海关伙伴合作关系。

有理有利有节开展对外斗争。动态跟踪研究国外贸易壁垒，全面加强监测评估预警，提前开展对策研究。强化政策储备，丰富对外斗争工具箱，做到斗争时拿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研究应对外国制裁、干涉、长臂管辖等相关措施，建立务实管用的救助保障机制。

坚持守正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中国画好海关“工笔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实施好“智关强国”行动，需要在过去

改革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发挥改革“关键一招”和创新“第一动力”作用，加快推进智慧海关建设，通过改革创新破题解题，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实现风险防控更精准、守护国门更严密、服务发展更高效、海关现代化建设步伐更扎实。

强化改革创新。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聚焦新情况新问题和制约海关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弱项，用改革的思维和办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进监管理念、制度机制、业务模式的全方位、系统性转型升级，提升海关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

坚持创新思维。注重新老制度的有效衔接，继承与创新以往改革做法，对接现有法规、技术体系和信息系统，做到先立后破、有破有立、不立不破。紧跟时代创新，着眼于形势任务的变化，总结新的经验，探索新的路子，运用新的技术，适当超前、预留空间。鼓励基层创新，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基层贴近企业和群众的优势，调动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做到符合党中央要求、贴合海关实际，满足企业和群众诉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特别是海关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的重大问题、守国门促发展的关键问题、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采取务实管用针对性措施，从根本上破解业务量快速增长与海关监管资源相对不足等一系列矛盾难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聚焦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中不断开创“智关强国”行动新局面。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监管优化服务一体推进，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寓服务于监管之中，做到“管得住、放得开”。统筹好业务和科技，坚持业务科技一体化，加强业务需求论证，以业务改革引领科技创新，深化科技供给侧改革，以科技创新赋能业务改革。统筹好全局和局部，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高效顺畅的“响应、呼应、反应”运行机制，站在全局谋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强化科技赋能。以数字为基础、“数智”为手段、“数治”为目标，以科技支撑引领海关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技术提升海关整体“智治”水平，实现从传统海关向智慧海关转变，从监管型海关向把关服务型海关转变，从大国海关向强国海关、向世界一流海关转变。

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围绕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未来所向、海关所能，从监管和服务场景入手，扭住关键、精准发力，建设应用支撑平台、大数据平台、业务协同平台、监控指挥平台、基础设施平台等“五大平台”。

加强海关科技应用。加强先进信息技术的探索运用和装备设备的研发配备，实施业务系统全面生态化、操作规范全面程序化、政策要求全面参数化、监管数据全面多元化、知识经验全面数字化、作业管理全面智能化的“六化”数字化转型。

强化科技有效供给。建立健全总署、直属海关、合作伙伴多方紧密协作的业务应用系统开发机制、全

多层次协同的一体化研发机制、各方主体联合的基础设施共建机制等“三项机制”。

强化组织保障。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实施“智关强国”行动，必须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建设一支坚强有力、敢战善赢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今年是国家授予海关准军事化纪律部队衔级20周年，海关将以此为契机，牢记光荣使命、殷殷嘱托，着力提升准军事化纪律部队建设水平，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海关干部队伍。

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聚焦党建高质量发展，发挥海关垂直管理、三级党委领导体制机制优势，落实党建主体责任，开展海关政治工作体系研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确保党的领导在海关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

树立鲜明导向。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一把尺、一张单、一盘棋”使用干部，崇尚“求实、朴实、简朴”的海关文化，干部在一线奋斗、考察向一线延伸，注重在艰苦复杂环境和急难险重任务中考察识别干部，既“伯乐相马”，又“赛场选马”，激励担当作为。

正风肃纪反腐。研究出台新时代加强海关准军事化纪律部队建设的意见，提升职业自豪感、荣誉感、认同感。时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健全海关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一体推进“三不腐”。加强新时代海关廉洁文化建设，持续擦亮“清风国门”品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